

# 供给侧改革的动因与规制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关系

王赫奕, 王义保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 供给侧改革作为当今的热点话题之一, 对我国今后的紧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者, 推行供给侧改革具有深刻的动因。旧常态下全面政府的博弈组合模式不再能适应新常态的大环境, 使得经济增速下降, 此时的政府在博弈之中需要对市场做出适当的让步, 恢复与“强市场”的并存的均衡路径。通过对两部门模型的分析, 找到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所在。并且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者——政府对微观经济体的规制也需要革新。如此, 在实现有限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的条件下, 才能使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以有效实施。

**关键词:** 博弈; 帕累托最优; 两部门模型; 规制; 互动

**中图分类号:** F0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18)03-0076-10

## Research on the Cause and Regulation of Supply Side Reform Based on the Gam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WANG He-yi, WANG Yi-bao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Public & Administration, Xuzhou 221000, China)

**Abstract:** Supply side reform, as one of the hot topic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s the implementer of the supply side reform,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ply side reform has a profound motivation. Game combination mode of overall government under the old normal no longer able to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environment, the decline in economic growth,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appropriate concessions on the market in the game, and “restore equilibrium path of strong market coexis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ply side reforms,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icro economy also need to reform. Thu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limited government and effective market,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can b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Key words:** game; pareto optimality; two sector model; regulation; interaction

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舒尔茨, 作为是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指出“所有的制度均是对现实生活中需求的相应”。伴随中国经济飞速

发展, 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升级阶段, 很多制度都非常的落后, 所以现在有非常大的制度创新需求。如果将全部的需求整合到一起, 可以用这

收稿日期: 2017-10-15      修回日期: 2018-02-02

基金项目: 本文受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依法治国视域下推进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研究”(编号: 15BZZ080) 资助; 2016 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依法执政的逻辑与路径研究”(编号: KYLX16\_0519) 资助。

作者简介: 王赫奕(1990-), 男, 河北石家庄人,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行政管理。

样一句话对其进行概括: 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到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让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当前存在的生产结构和制度结构和大部分家庭的各种需求已经不再相符, 这样是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基于此, 我国政府进行了改革, 并提出了“释放新需求, 创造新供给”。

### 一、动因 “强政府 - 弱市场”向“强政府 - 强市场”组合模式的演进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保证经济增速的稳定, 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地激发出市场活力, 提高供给侧的适应性与灵活性。所以, 构建一个富有活力、能够保证经济发展的市场, 是当下政府推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更加密切。

#### 1. 强政府 - 弱市场的现状分析

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实际上, 具体表现成“两只手”间的博弈, 也就说, “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博弈。首先, 政府被当成是一个较为庞大的政治性权威组织, 可以借助于公共政策以及制度设计等多样化的渠道, 进而对社会经济的各项活动产生必要的影响, 实际上, 也就是所谓的“无形的手”; 其次, 面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实际阶段下, 市场中的交易双方主要是借助于交易活动的形式进而可以塑造一个具备了自运行系统的市场机制, 并且该机制具备了显著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革新等多个方面的自我管理能力, 也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之间的博弈, 进而造成了市场和政府间存在很多种关系的模式。我国现在用的组合模式是“强政府 - 弱市场”, 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制度协调与力量较为强大; 并且, 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而造成了市场的自我管理能力依旧非常薄弱。所以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 “强政府 - 弱市场”的组合模式最利于我国的发展。

然而, 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是不断演进的, 其具备了非常显著的合作性质。假如该种博弈能够一次性完成, 则能显著表明博弈的结果。假如政府干预派具备非常强大的力

量, 则容易塑造出一个政府全面干预的经济管理模式, 那么因此就构建起一个完全市场自由的制度安排模式。前者就好比是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所具有的经济管理方式, 但对于政府全面干预的模式而言, 它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典型性特征的, 是在 1930 年之前,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但是, 政府与市场这两种主要力量间的博弈并非一成不变, 这种博弈真正的表现形势是一个动态的重复博弈。这就意味着“强政府 - 弱市场”的博弈结果, 抑或这种组合模式, 会随着具体国情的变更而变更。即使在我国属于不完全博弈, 但两者之间的力量仍然会产生均衡 - 非均衡 - 均衡这样的动态过程。

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来说, 其实际上是处于相对不完善的市场以及相对不完善的政府结构当中而具体展开的不完全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处于市场不完善的前提条件之下, 假如仅依赖于市场配置社会资源, 因为存在着外部效应以及信息不完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因而极为容易造成市场失灵, 暴露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等的问题, 导致较为低下的配置, 从学理层面上对其进行定义, 就命名为“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基于两元建构的环境之下, 人们进而直接转向于对政府的干预寻求帮助, 要求在政府的介入的前提下, 有效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的最终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市场的一部分缺陷, 因而随着诞生了“强政府 - 弱市场”的组合配置。然而, 政府在干预时非常容易导致膨胀的发生, 结果太多的干预在多数情况下会对市场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 对于社会资源在社会当中的合理分配与有效整合有非常不利的影响。除此之外, 由于无法规避的政府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的非公共利益性的成本因素以及政府寻租行为的出现, 最终结果就是造成了“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 的严重后果。因此, 处于两元建构的社会大环境下, 政府与市场间的选取非常容易构成一种“两难选择”, 两者间具有失衡的现象。政府没有受到一定限制的权力则容易影响到市场以及社会。基于此种情况下, 单纯依

赖于市场或者是政府就无法尽快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终目标,也无法在特定时期内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 2. “强政府 - 强市场”的均衡路径

法国的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在对系统内“互补性中的对立性”加以论证的过程中,具体指出了:“所有的系统和组织关系,均包含互补有对抗的力量。所有的组织关系均和互补性这一原则息息相关,同时也不能缺少对抗性要素。此时此刻互补性要素就在大框架之中孕育出对立性要素<sup>[1]</sup>。”在经济市场运作的程式里,政府和市场这一对博弈对象亦是这种关系,两者除了具备了较为显著的互补性之外,还具体表现出势不两立的局面。从历史角度来看,人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处在经济系统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的理解,通常局限于二元对立的框架,针对此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其在很大程度上给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问题造成诸多方面难题。但是,政府与市场并非此即彼互不相容,“强政府 - 强市场”的组合配置存在即是合理的,又是现实的。

对于“双强”的理想路径,从根本发掘,它是指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能力,而在微观经济领域里则依赖于完善而成熟的市场本身的自我管理能力与调节机制<sup>[2]</sup>。

就趋势来分析,中国政府与市场间的博弈会从原来的不合作博弈过渡到现代的合作博弈形式,由于政府与市场间的博弈需要通过反复、无限次数地进行下去,特别是当博弈的双方经过了反复多次博弈以后,发现了合作的远期收益要远远大于不合作所能够创造的短期收益,那么就要求借助于对触发策略进行设定,从而展开合作。同时,政府与市场间的的博弈也从原先的“非帕累托改进”直接向“帕累托改进”形式进行转换。基于此,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凸性组合”状态,进而最终达到政府与市场之间“两只手”处于经济管理活动过程中所体现的互补性。基于该角度,综合政府 - 市场之间博弈结果的组合模式,今后在我国经济管理活动当中若要充分

发挥强效的作用,需要是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两者之间共同作用,不是像囚徒困境模型那样只有一方获益或发生作用的模式。综上,以“双强”的基本博弈模型出发,它不仅仅是后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之间相互融合而成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是世界各发达国家政府市场配置的发展趋势。

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最初博弈格局中强政府的力量配置是符合我国发展要求的。但是,伴随我国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需求、政府权力和市场环境等等要素不断变更。强政府 - 弱市场的格局不再适合社会发展,供给的分配不均和总量不足,使得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虽然强政府的存在就中国的发展现状而言,具有强力的理论与现实支撑,更是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强政府的博弈对象——弱市场的存在无法与当今的政府和社会进行有效匹配,在博弈格局中,不再能和政府进行互动,达到帕累托最优。所以,就产生了当前经济增速下降、市场活力不足的现象。这也就形成了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动因。那么,具有很大活力的强市场的力量配置就成了当务之急。

从 2008 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趋势,然而对需求领域的政策推动结果不尽人意。供给侧的改革成了稳定与增加经济增速的一个突破口。当前的我国高层谈话中的高频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为向“强政府 - 强市场”组合配置演进铺设了路径,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基于生产端和供给端来进行改革,让生产力得到解放,使我国的经济获得持续的发展<sup>[3]</sup>。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达到最优配置时,市场就可以在政府的配合之下发挥其应当发挥的最大功效,至此“强市场 - 强政府”的理想博弈格局便会形成。但是该格局的最终形成,亦需要长期的演进过程,强政府与强市场的理想格局还需经过长时间反复博弈,才会达到最和谐最均衡的状态,而当前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可以看作是该演进的第一推动者。

二、现状: 供给侧改革的内生性原因分析

1. 政府对市场刺激性政策舛错的困境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博弈, 都是通过货币流通实现的。凯恩斯主义指出投资、消费和出口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 其中政府投资又是主要手段。而自由主义则提倡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货币可以实现商品的流通, 但是它在流通过程中经常由于各种原因被存放起来。施密特指出, 当货币闲置时, 它就不再是流通工具, 而是财富存量<sup>[4]</sup>。所以货币流通理论认为, 货币对宏观均衡产生影响主要是在货币被用来购买商品时<sup>[5]</sup>。当这种政府与市场博弈的媒介被作为财富存量储备时, 就意味着这部分作为流通手段的媒介得消失了 (虽然有些作为银行储蓄, 转化为了资本投资, 但是消费环节的货币却不复存在)。该环节货币的消失, 成为了结构性问题的开始, 导致政府对市场的政策出现偏差, 甚至陷入博弈论囚徒困境的上升螺旋中。

如图 1, 将两部门模型作为前提条件, 假设整个经济体只包含投资和消费两个生产部门, 开始时两者以均衡状态维持。假定一种外生性因素产生, 使得民众感觉到风险的存在而消费的意愿下降, 部分货币会因此“沦落为”财富存量, 而丧失了流通能力。此时, 为了保障经济的均衡状态, 政府出面, 开始不自觉地与市场进行博弈。政府通常会刺激生产部门的投资, 来弥补下降的消费需求, 使得经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回到之前的均衡产出水平。但现实情况却是, 实际的投资比之前的均衡水平要大, 而消费比之前的均衡水平要小, 这次投资周期结束之后, 由于产品一经产出, 就在自己全部价值的限度内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sup>[6]</sup>。所以就会有新的生产能力形成, 产能也会比之前的均衡产出水平要大。但是投资品方面的需求是比之前的均衡水平要小的, 这就会导致投资品部门出面来将产品买入, 不然的话就会导致产能过剩这一状况的出现。而要想将增加的产能消除, 就要引来新的刺激政策来产生新需求, 如此才能使投资供给品的增长得到平衡, 但是这又会导致在接下来的生产周期出现更加庞大的产能, 如此一来则会使使得投资品生产部门持续的变大, 同时使得政策刺激规模也持续的变大。一旦施行刺激政策, 便会又一次出现供求失衡, 而且会更加的严重。出现投资小于原有均衡水平的情况时, 刺激投资的政策是有效的, 在中长期内就会一直出现新的供需失衡<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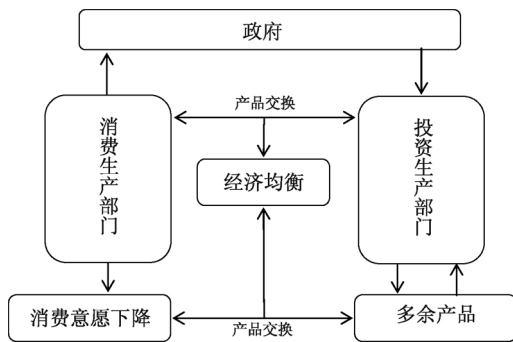


图 1 两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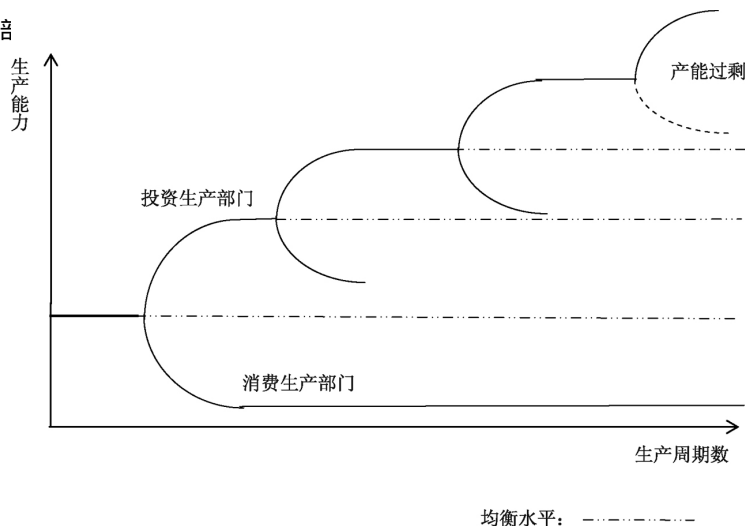


图 2 两部门模型的产能过剩分析

这种模式放到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现状,则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过高的储蓄就意味着更高的投资,过高的投资必然会导致产能的进一步增加,在生产周期不断的循环后,如图 2,投资生产部门的多余产品多到无法再通过自己来购买,那么产能过剩的情况便应运而生。然而面对这种博弈状态情况,政府仍然有其他道路可供选择。这条道路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该部分可以看作是两部门模型的第三部门,如若处于博弈劣势方的政府不做刺激生产性投资,而是将这部分投资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就能改善这种劣势。但是,假如基建比实际需要还要高,就会导致产能过剩,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应是单纯的财政扩张,同样需要有合理的限度。

所以,在这场政府与市场博弈中,政府也容易陷入上升螺旋的困境之中。消费生产部门与投资生产部门,实际上就代表着市场中的需求侧与供给侧,投资生产部门的产能不断扩大,经历了数个生产周期后,投资生产部门无法消化自身的产品,结果造成了供给侧的产能过剩。此时需要用政府“有形之手”,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克服阶段性的需求不足<sup>[8]</sup>。同时,减税、国企改革、放松市场管制、放松金融约束和抑制也上升到了宏观经济改革举措的中心位置<sup>[9]</sup>。

在面临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快速回落,中国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推行了四万亿计划,四万亿计划的重点投向与资金测算见表 1。可以看出四万亿计划中,将近 70% 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四万亿计划由于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对缓解经济危机、改善民生、灾后恢复重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同时也有效地遏止住了经济的下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四万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果。正如前面所说,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面对如此大的投资数目,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产能过剩局面的出现。所以这就成为了当今中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愿意之一,即解决当前中

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表 1 四万亿计划投资明细

基本属性	资金测算
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	约 4000 亿元
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 and 基础设施	约 3700 亿元
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	约 15000 亿元
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	约 1500 亿元
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	约 2100 亿元
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约 3700 亿元
灾后恢复重建	约 10000 亿元

数据来源:发展改革委网站。

## 2. 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归纳

供给侧改革涉及的主要是经济领域,不管是特定行业去产能,还是清理僵尸企业等等,都过多地关注于使用经济调节的手段推进政策的施行。然而,政府作为改革的主导力量,应更多地从政治行为及行政职能的角度反思改革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公共政策的制定、施行过程中寻求改革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总结来看,有如下几点:

### (1) 市场环境的失序是造成改革困境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体制,它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公平竞争、有序发展是市场经济体制盛行的根本原因。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要让市场发挥主要作用,还要让政府在市场出现失灵状况时能够进行适当的调节,政府所需要做的是创造一个有序的并且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过要想让市场发挥作用就需要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资源配置必然涉及公平正义的问题,非正义的资源配置必然造成坏的影响,让市场环境变得无序化,进而让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我国很多区域存在一些寻租、不公平竞争等现象,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同时也使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受到了破坏。因此,发挥供给侧改革的积极作用,需要政府创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要对合法的知识产权进行相应的保护和激励,同时还要保证公平正义,让企业可以和谐持续地发展下去,保证我国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

(2) 政府职能定位的不合理是造成改革困境的主要原因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职能的合理发挥,要让经济能够有一个中高速增长,就要基于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且从结构性出发加大改革力度,通过供给创新来刺激需求,进而通过需求的增加来让供给进一步升级,让结构调整与经济稳定增长相互协调发展。从中长期看,我国在供给侧改革方面主要是做好结构性减税,鼓励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小微企业进行扶持,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来促进供给的升级。不过,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扮演“全能型”政府角色。政府决策高度集中,管理机构冗杂、职责模糊,缺乏健全的规章制度,管理手段过于集中、强硬,管理效率低下,极大地抑制了公民等其他主体参与改革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职责定位的模糊也是造成改革受阻的重要原因。对于“供给侧改革”来说,政府主要需要尽两个方面的职责:第一,使“制度性交易成本”得到较大的降低,让市场发挥充分的作用,让“看不见的手”帮助经济发展;第二,要进行国际改革,并要加快改革的速度,让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起到应有的作用。国企在我国地位显著,借助合并重组来使其竞争力获得提升,从而让我国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正是这两方面职责的不合理定位,才导致政府权力集中,改革效率低下。

(3) 产业政策缺失是造成改革困境的外在原因

我国的经济当前正处于转型时期,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不再和以前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迅猛,现在已经比第二产业的贡献值还要多,第三产业占到了总值的一半以上;而且,在我国的GDP中,消费所占比重提高了很多,这些说明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很大的优化,这就要求产业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供给侧相关的产业政策大多集中于战略、新兴和绿色产业等,通过政策来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从而出现“洼地”效应,让政府的干预尽量减少,从而使制度成本有所降低,和创新“高地”效应相应,共同

发挥其中的价值。然而,实践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对产业政策及方案的认知存在偏差。一些改革方案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指导,不过这些意见和方案却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和落实。领导部门和执行部门要充分协作,做好改革力度、进度和配套措施协调统一。

### 三、规制:新常态下政府职能的转变

通常所说的规制,实际上就是指政府出台相关规定加以限制。作为一种具备完善性的制度安排,规制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将改进与优化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当成是最终目标,政府对经济主体活动进行各种干预的行为。所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规制的实施者为政府(如图3),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无论是从动因到规制,还是从规制到关键,都是政府在推动。然而,由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对经济体制所做出的规制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才能使得供给侧改革得到有效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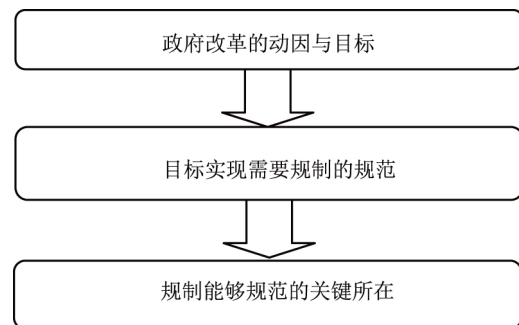


图3 供给侧改革的发展路径

在以前,我国的经济属于赶超型经济,并且非常具有典型性,我国政府采取的也是赶超型的产业政策,同时实施相对应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其进行支持,基于此来促动我国经济高速的发展。这属于一种后发优势,当前我国的经济已经步入了新常态,虽然我国经济还有一些赶超型经济所具有的特征,不过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无几,所以能够赶超的空间也在逐渐消失,我国借助产业政策来带动经济发展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因此具体政策要进行适当的调整<sup>[10]</sup>。伴随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开始逐渐地向着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方向发展,让国

营和民营企业都能享受普惠性政策,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 1. 政府规制的松弛与除弊的基本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规制的要求,包括对规章制度的除弊和松弛这两个方面。如果相应的规章制度太多,就会让企业的发展和活力受到束缚,同时使它们的交易成本变大,出现制规失灵现象。在以前,我国的市场机制没能发挥充分的作用,原因就是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经济,导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结构性矛盾。例如,出现了很多的“僵尸企业”,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所以,无论是基于市场化发展,让制度障碍得以打破,引导创新能力和资本等要素资源配置到需求更高的企业,让供需出现新的平衡,还是防范行政垄断,让行业市场准入门槛有所降低,让所有企业都有一个平等的待遇,这些都需要政府对规制进行放松,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让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得到增强。

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让新产业得以发展,得到一个更优化的供需平衡,要想实现这些,单单依赖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周期也会很长,所以要对规制进行完善,让政府规制发挥更好的作用,进而让供给侧改革得以顺利的进行,让市场失灵问题得以解决。因此,要对相关的法律体系进行完善,确保有一个完善的规制法律体系,同时要保障执法力度,让执行效果得以保证,从而有法可依地施行去产能。同时还要对社会监督体系进行完善,让社会监督帮助经济发展。除此之

外,还要进行制定行业方面的标准,其中包括了环保、安全和质量等标准,让落后产能被淘汰掉,使产品质量得到提高。还有就是,让规制变得更加透明,同时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制制度。

#### 2. 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规制

在供给侧改革中,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规制,通常被当成是政府实施供给侧改革时必须有的要求。对其进行实现时主要依靠两个方面:政策方面的引导和监管方面的约束。政策方面的引导是政府利用相关政策的制定来对企业进行影响,从而达到相应的目的,主要采取的手段是财政补贴和税收<sup>[11]</sup>。按照庇古的相关理论,政府要对那些具有负外部性的企业进行征税,通过征税的方式来减少负外部性,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反的,对于某些行为具备了鲜明的负外部性,那么则要求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的方式避免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超过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水平;反之,对于某些行为具备了鲜明的正外部性,那么则要求政府借助于补贴的手段来使其能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水平相符。财政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具有显著作用,以中国批发和零售行业的情况为例如表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 2015 年实施,在 2014 年期末商品库存额达到了近五年的最大值 38123.8,这明显是由产能过剩导致的库存量增大,在 2015 年实施供给侧改革后,库存量明显下降,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所以,供给侧改革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引导可以最直接的发挥作用,对其的规制更有必要。

表 2 中国零售与批发行业情况表

指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底
法人企业(个)	125223	138865	171973	181612	183077
年末从业人数(万人)	901.1	985.6	1139.6	1182.0	1173.6
商品购进额(亿元)	328160.3	378314.8	451265.1	493664.0	468071.7
进口额(亿元)	27230.6	31524.7	37358.7	38571.4	33943.6
商品销售额(亿元)	360525.9	410532.7	496603.8	541319.8	511167.5
出口额(亿元)	17795.0	20004.8	22452.6	23013.9	22719.5
期末商品库存额(亿元)	24979.3	29000.6	32422.0	38123.8	36501.7

数据来源:2016 中国统计年鉴。

监管主要是对个人和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用标准对行为进行规范,维持社会和市场的秩序,以此处理市场上出现的问题,使政策目标得以实现。换句话说,监管是政府的一种直接干预行为,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要求经济主体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发达国家,监管通常是用来处理和自然垄断相关的问题,以及环境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信息不及时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虽然监管直接干预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但是这同传统的行政手段是有差异的,监管是基于公开的规则来进行的,他并不是内部之间进行的相关协调,它是从公共利益出发的一种行为。我国在进行经济转型时,在监督管理方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监管力度过大,也就是政府依然管理不该其管理的问题,尤其是某些竞争性领域,价格和投资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是监管不足,也就是有些归政府管的问题政府却没管,尤其是突破传统内部协调以后,缺乏对市场交易环境的社会性监督,致使企业野蛮生长;第三个是没有健全的监管体系,尤其是在监督自然垄断环节上,割裂了监督管理的职能,对价格、投资、运营和质量、成本的管理不能很好地统一起来。为了让监督管理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不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方面要坚持放权和管理相结合,对竞争性领域的监督管理要放开,使社会性监督得到增强,完善现代监督管理体系,使投资、市场准入、服务质量、价格和成本等方面的系统性监管职能得到加强,增强精准化管理。

政府没有直接加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政府通过制定制度来让市场有一个可以发展的环境,所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全部市场化改革均可以说是供给侧改革,不管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还是非公经济的提倡,这些都是和我国的制度改革政策相关的。我国的供给侧改革让经济有了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并且日益变得宽松,这其中的作用使得我国经济在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 四、关键:有效市场与有限政府良性互动

实现政府对经济体规制革新的关键,就是使

得政府与市场的之间可以得到良性互动。因为规制并非一蹴而就,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府的规制也应当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而两者的有效互动,可以使得博弈双方互相达到充分的信息与反映的对称状态,不断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强政府-强市场”的组合模式就是表现之一。如此,无论经济形势是由旧常态到新常态,还是有新常态到下一个新常态,政府的规制出台总是可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这才是最终的目标,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所在。

当前供给侧改革的最大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没有设置合理的治理边界,政府与社会和市场之间还存在问题,缺乏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政府的治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建立“强政府-强市场”的组合模式,不仅仅是两者势力上的强弱,还要政府与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博弈中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有很多,但是实现良性互动,必须要做到有效市场与有限政府的同时建立。

##### 1. 职能定位合理的有限政府

从客观上来说,我国的改革之所以可以如此成功(当然这其中只关注了发展,而没有充分考虑治理,改革是有非常多的问题的),是因为我国没有一直进行计划经济,将权力下放,大幅度减少政府的干预,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降低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所以,我们要用实验物理学的方法论来讲差异因素的基本概念,即除了党的领导、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因素包括: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自由、将政府权力进行下放、引进竞争机制(包括对内和对外,以及中央和地方)、坚持对外开放,基于这些制度性市场改革,我们的国家才可以有这样的宏伟的成绩。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改革又有所后退,又开始走政府主导的路,每次面临问题,就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就会采取政府主导的形式来处理问题,如此一来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因为很多地方对供给侧改革的片面和机械性理解,很多地方甚至出现



了通过任务分解的方式来替代企业解决问题,这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相反,会让问题变得进一步恶化,让市场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而且政府过度的干预让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难以发挥,导致很多的寻租和不公平等事件发生,最终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坏的影响<sup>[12]</sup>。

我国政府实质上依然是发展型的,在很多时候我国政府都有对发展逻辑重视,而对治理逻辑置若罔闻的现象。这就会使得我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依旧起到主导作用,这样就会导致很坏的影响,越位处理问题,给市场作用的发挥带来了很大的束缚,然而政府在对市场秩序维护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依然存在很大的缺陷,政府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远远不够,没能让政府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是体制机制改革,要将效率的问题处理好,对影响市场效率的监管框架和环境进行改革,对政府职能进行更好的定位,这样来处理政府同社会以及市场的治理边界,使市场经济能够良好地发展。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合理界定政府的定位。特德·盖布勒和戴维·奥斯本两位学者非常提倡政府体系重建,他们指出了公共管理改革相关的十大原则。第一条便是,要对政府职能进行改变,政府要作为掌舵人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划桨人<sup>[13]</sup>。

## 2. 供给制度完善的有效市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关键的是深化市场制度改革,让不同的所有制可以进行公平的竞争,基于此来提高我国市场的效率,让政府起到服务性作用。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市场经济,提高民众的信心,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处理好发展以及治理的逻辑,做到两者兼顾,这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必然选择。这就是我国现在为什么要减少政府在市场上面的干预,政府要适当的放权,让市场掌握应有的职权,使市场发挥充分的作用,让资源配置变得更加优化<sup>[14]</sup>。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统一起来,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依法治国的理论,不断进行改革创新,

实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发展,在进行结构性改革时坚持法制化和市场化,以此更好地处理做什么、谁来做、如何做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坚持推行市场化制度化、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下放、政府减少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不这样做的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明确的内涵,很多政府机构要么不去做,要么会依据自己的想法,甚至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改革没有实现应有的效果。倘若不深化市场化制度性改革,中国将会出现经济持续大幅度跌落的现象。当前改革很多都是简单套用经济学理论,对经济政策进行错误的使用,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说通过重商主义政府拉动工业革命就能使问题得以解决,还有人认为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力度就能改善目前经济下跌的态势。这些想法都认为市场化改革不重要,无需重视长期治理就能使工业化得以实现,就可以改变经济持续大幅度下跌的劣势。这是不现实的,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成效甚至只能是空想,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严重的会导致态势向反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很多政策工具和经济学理论都是在非常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下产生的,因此很多经济理论均是基准经济制度环境下产生的产品,不可以将它们生搬硬套,不能将它们直接应用到中国,以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为例,例如要加强和非主要农作备案制适合的相应政策,备案、认定标准等需要“因种施策”<sup>[15]</sup>。因为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新兴经济体还没有实现转型。倘若不考虑前提,直接将理论进行引用,只能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产生反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做到法制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基于此来对做什么、谁来做和如何做等问题进行解决,最关键的是坚持推行市场化制度化、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下放、政府减少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在解决经济下跌的问题时,我国政府也应该采取一些短期的政策手段,比如加大国企改革的力度、不对民企进行限制、实行结构性减税等等,用这种手段来提升社会民众的信心,使企业的活力得到激发,拉动居民消费,使经济增长的内在

动力得到增强。这样才能解决目前经济下落的问题,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好发展和治理逻辑的关系,促进经济向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埃德加·莫兰. 方法:天然之天性[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3.
- [2]刘祖云.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J]. 江海学刊,2006(2):108.
- [3]滕泰,范必. 供给侧改革[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236.
- [4]SCHMITT B. A new paradigm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oney prices [C]. Money in motion: The postkeynesian and circulation approaches. 1996:132.
- [5]GRAZIANI A. The monetary theory of producti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2003:17.
- [6]让·巴蒂斯特·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M]. 陈福生,陈振骧,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7.
- [7]吴敬琏. 供给侧改革[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99.
- [8]凯恩斯. 货币论:货币的纯理论[M]. 何瑞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5.
- [9]滕泰. 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J]. 世界经济研究,2013(12):3.
- [10]沈越. 新旧常态转换与政府行为调整:兼论供给侧改革[J]. 天府新论,2016(3):113.
- [11]林卫斌. 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18.
- [12]田国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建立有效市场和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是关键[J]. 学术前沿,2016,(14):29.
- [13]David Osborne and Ted Gaeble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M].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2:156.
- [14]谌贻琴.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J]. 求是,2014(7):30.
- [15]周华强,王永志等. 中国农业品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问题和思路[J]. 中国软科学,2017(11):27.

( 本文责编:辛 城)